

臺灣有關法國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的翻譯、 評介與研究論述〔1972~1999〕

鄭志敏

摘 要

本文共分前言、綜覽與回顧、反省與檢討及結語等四部份。前言中簡述行文之動機與目的，主要是爲了提供入門者一認識年鑑學派的方便路徑，避免盲無頭緒的困擾。綜覽與回顧部份，則製表依年份列出本地有關年鑑學派的翻譯、評介與研究論述等三方面的著作，並大致介紹其內容與作者。反省與檢討部份，則從歷史學的觀點出發，提出對近三十年來臺灣學界在引介年鑑學派過程中的得失，並檢討歷史學界本身的不足之處。最後在結語部份，則是呼籲本地的歷史學界，不論是否師法年鑑學派，都應該擺脫只是做爲西洋史學界穿針引線者的角色，在未來的世代中，塑造出自己的獨特風格，走出中國史學的新路。

關鍵字：Annales School，Fernand Braudel

壹、前言

如果要舉一個對二十世紀全球歷史學和社會科學影響深遠，且至今仍在持續發展中的歷史學派，成軍於一九二九年的法國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應可當之無愧。從最早期的年鑑學報創辦人，費弗爾(Lucien Febvre)與布洛克(Marc Bloch)，到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漸帶領年鑑學派稱霸法國史壇的布勞代爾(Fernand Braudel)，年鑑學派從原先非主流的異端角色，歷經約半個世紀的奮鬥，終能成為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主流學派。西方歷史學能在社會科學長期強有力的衝擊挑戰後，依舊屹立不搖，年鑑學派可謂功不可沒。布勞代爾之後，以勒華拉杜利(E.Le Roy Laudrie)、勒高夫(J.Le Goff)為代表的新一代年鑑史家，在其前輩的基礎上，力圖為年鑑學派尋找新的發展契機，以心態史學建構當代的「新史學」派，成就雖未如前代普受世人肯定，但也充份展現出年鑑學派本身因應不同時代內外環境變遷下，所具有的雄厚根基與應變能力。

面對年鑑學派的全球性影響力，向來對西方學術理論多所依賴的臺灣，自然也有所回應。回應的方式，除了較原始的翻譯與評介外，累積長期的認識與研討，臺灣也產生了少數具有深度的研究論述，部份學者更已展開對年鑑學派某些理念的批判。總的來說，二十多年來臺灣對年鑑學派的譯介與研討，在一定程度上，有著可觀的成果。遺憾的是，相關資料散佈甚廣，哀集不易，對一個不懂法文、不諳英文的入門者而言，瞭解年鑑學派或許仍須從中文作品入手，但到目前為止，我們卻找不到一篇對年鑑學派二十多年來在臺灣被翻譯、評介及研究論述等，作過概括性分析的中文報告。

職是之故，筆者想以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來拋磚引玉，進行這件學界迄今未做的工作。全文主要在提供有興趣瞭解年鑑學派者基本資料的參考，也不揣鄙陋地要對臺灣學界，特別是歷史學界在面對年鑑學派的挑戰時，所做回應的得失，予一簡要的反省與檢討。其中疏漏自多，尚望熟悉此道的各方大雅君子，不吝賜教。

貳、綜覽與回顧

以下先依翻譯、評介與研究論述等三大領域，將二十多年來在臺灣地區所出版(包含部份大陸學者在臺印行的相關著作)有關年鑑學派的論著，製成三張表格，備供後文討論之用。表格中篇名前加註「B」者為專書，其餘為單篇論文或書中的部份篇章。此處擇取論文的標準，乃以其標題與年鑑學派直接相關者為主，至於某些論文可能標題與年鑑學派無涉，但內容有部份間接相關，或者所用的研究方法乃取法自年鑑學派，此已進入年鑑對本地學術研究的實質影響層次，並非本文的處理重點，且整理上甚為不易，為免討論上的籠統龐雜，在此均暫時割愛。

表一、有關年鑑學派的翻譯

篇 名	譯 者	出 處	出版時間	譯者背景
布洛克：「《封建社會》」選 第十一章「附庸謹見禮」、第五章「感情與思想之模式」	李弘祺	李弘祺主編《西洋史學名著選》第二十一章「布洛克與布勞德」，頁 394~406，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82 年 11 月	歷史學
布勞德：「《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選	李佩珊 李弘祺	同上，頁 407~412	同上	歷史學
心態歷史	梁其姿	《思與言》20 卷 4 期	1982.11.	歷史學
政治是否仍為歷史之骨幹？	李豐斌	收於李豐斌譯《當代史學研究》頁 335~363，臺北：明文書局	1982.12.	
新歷史(上、中、下)	梁其姿	《食貨月刊復刊》12 卷 10/11 期、12 卷 12 期、13 卷 1/2 期	1983.2 1983.3 1983.5	歷史學
史學一生：法國年鑑學派領袖布勞代爾	賴建誠	《食貨月刊復刊》15 卷 5/6 期	1985.11.	經濟學

(Fernand Braudel) 訪問錄				
爲史學過一生----專訪布勞岱(摘譯)	賴建誠	《中國時報》1985年12月5日第8版	1985.12	經濟學
布勞岱的幻燈----簡介「日常生活的結構」及其作者	沈積	《哲學與文化》13卷3期	1986.03.	
年鑑學派	賴建誠	《史學評論》第十二期	1986.07.	經濟學
我與年鑑學派：布勞岱代爾的答覆	賴建誠	《思與言》25卷3期	1987.09.	經濟學
馬克布洛克 (Marc Bloch) 的歷史著作	賴建誠	《思與言》25卷6期	1988.03.	經濟學
法國年鑑歷史學派	賴建誠	《思與言》26卷3期	1988.09.	經濟學
布勞岱·歷史學家·「局勢中的人」	劉北成譯 丘爲君校訂	《當代》第30期	1988.10.	大陸學者
B 論歷史	劉北成	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1988.12.	大陸學者
B 史家的技藝	周婉窈	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1989.01.	歷史學
新史學：年鑑學派的繼承者	賴建誠	《思與言》27卷1期	1989.05.	經濟學
馬克·布洛克的生平與著作	賴建誠	《歷史月刊》第17期	1989.06.	經濟學
城市：文明的推動者 1200~1500	夏伯嘉	收於夏譯《歐州經濟史中古篇》頁67~108，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1989.07.	歷史學
中古農業：900~1500	夏伯嘉	同上，頁141~186	1989.07.	歷史學
B 年鑑史學論文集	梁其姿 編譯	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1989.10.	歷史學
馬克·布洛克的思想根源	賴建誠	《思與言》28卷1期	1990.02.	經濟學
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	賴建誠	《中山社會科學季刊》6卷1期	1991.03.	經濟學

馬克·洛克著作的評價與影響	賴建誠	《思與言》28卷2期	1990.06.	經濟學
《地中海與菲利浦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序言	賴建誠	《思與言》29卷3期	1991.09.	經濟學
B 法國當代新史學	姚蒙、 李幽蘭	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1993.09.	大陸學者
我的父親馬克·洛克	賴建誠	《當代》第90期	1993.10.	經濟學
布勞岱後的布勞岱---- 布勞岱夫人的見證	賴建誠	《當代》第92期	1993.12.	經濟學
B 資本主義的動力	楊起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4.	
訪勒華拉杜利談新史學	賴建誠	《當代》第94期	1994.02.	經濟學
地中海與菲利浦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La Mediterranee et le Monde Mediterranee a l'epoque de Philippe II)	林芳儒 賴建誠	《當代》第99期；第101期；第102期；第103期	1994.07. 1994.09. 1994.10. 1994.11.	經濟學
B 封建社會(I、II)	談谷錚主 譯，家銘 校閱	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1995.04.	大陸學者
B 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 1929~89	江政寬	臺北：麥田出版公司	1997.01	歷史學

表二、有關年鑑學派的評介

篇名	作者	出處	出版時間	作者背景
Bloch, Marc (1886~1944)		周憲文主編《西洋經濟學者及其名著辭典》頁66~67，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72.08.	經濟學
白德爾與當代法國史學	汪榮祖	《食貨月刊復刊》6卷6期	1976.09.	歷史學

馬克布洛克與法國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	夏伯嘉	《史學評論》第一期	1979.07.	歷史學
費南·布勞岱的整體史學：《地中海與菲利普第二時代之地中海世界》簡介	顏建發	《史學評論》第七期	1984.04.	社會學
芸芸眾生的歷史----談布勞德和他的新書	李弘祺	《中國時報》1984年10月27日第8版	1984.10.	歷史學
從異端到正統----布勞岱與「年鑑學派」	康樂	《中國時報》1986年1月16~17日第8版	1986.01.	歷史學
法國歷史重新看----大史家布勞岱的遺作問世	楊定	《中國時報》1986年4月11日第8版	1986.04.	
布洛克(Bloch, Marc)	劉翠溶	于宗先主編《經濟學百科全書》第一編「經濟史」頁67~71，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1986.05.	歷史學
壯闊的三重奏：當代史學巨人卜洛德	林載爵	《聯合報》1986年10月11日第8版	1986.10.	歷史學
費南·布勞岱過世：「把歷史冰山顛倒過來」的歷史學家	楊定	《中國時報》1986年12月1日第8版	1986.12.	
布洛克與《史家的技藝》	康樂	該文為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一書的〈導言〉	1989.01.	歷史學
年鑑學派與法國大革命	李永熾	《中國論壇》28卷7期	1989.07.	歷史學
為史學辯明----評介馬克·布洛克的《史家的技藝》	賴建誠	《中國論壇》29卷5期	1989.12.	經濟學
世界體系中的「年鑑學派」	楊照	《中國論壇》32卷1期	1991.10.	
(書評)年鑑學派創始人馬克·布洛赫傳記	賴建誠	《當代》第69期	1992.01.	經濟學

亦兄弟亦敵人----年鑑學派兩位創辦人之間的情誼	賴建誠	《歷史月刊》第 51 期	1992.04.	經濟學
臺灣對布勞代爾的介紹與理解	賴建誠	《中國論壇》32 卷 6 期	1992.04.	經濟學
書評：劉北成譯《論歷史》	賴建誠	《新史學》3 卷 2 期	1992.06.	經濟學
戰後歐美史學發展趨勢	夏伯嘉	《新史學》3 卷 2 期	1992.06.	歷史學
中國年鑑派史家的困境	Miche Cartier	《淡江史學》第 4 期	1992.06.	法國漢學家(明清史)
布勞岱史學與社會學--澄清賴建誠先生的誤解	張家銘	《中國論壇》32 卷 9 期	1992.06.	社會學
書評：Peter Burke 著《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	王汎森	《新史學》3 卷 2 期	1992.06.	歷史學
《年鑑學報》衰極而盛----初創時期一九二九—一九四五的歲月	賴建誠	《當代》第 106 期	1995.02.	經濟學
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布勞岱的異見	賴建誠	《歷史月刊》第 39 期	1995.04.	經濟學
評《歷史論文集 II》	賴建誠	《新史學》7 卷 3 期	1996.09.	經濟學
評《年鑑學派管窺》	李弘祺	《歷史月刊》第 56 期	1996.09.	歷史學
書評：布勞代爾的《意大利模式》	賴建誠	《思與言》34 卷 4 期	1996.12.	經濟學
書評：Fer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文明的文法)	賴建誠	《新史學》8 卷 1 期	1997.03.	經濟學
書評：顧良譯《法蘭西特性》	賴建誠	《新史學》8 卷 2 期	1997.06.	經濟學
評 Giuliana Gemelli 著	賴建誠	《新史學》9 卷 1 期	1998.03.	經濟學

《Fernand Braudel》 & Pierre Daix 著《Braudel》				
--	--	--	--	--

表三、有關年鑑學派的研究論述

篇 名	作 者	出 處	出版時間	作者背景
從社會科學到社會整體歷史：現代西洋史學之危機(二)	李弘祺	《史學評論》第三期	1981.03.	歷史學
布勞岱(F. Braudel)與韋伯(M. Weber)：歷史對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的意義	高承恕	收入瞿海源、蕭新煌主編《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82.07.	社會學
整體的社會學與歷史學之會通：Emile Durkeim、Marc Bloch、Fernand Braudel	顏建發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高承恕指導	1983.06.	社會學
馬克·布洛克及其《封建社會》	顏建發	《史學評論》第七期	1984.04.	社會學
心態歷史	梁其姿	《史學評論》第七期	1984.04.	歷史學
年鑑學派的史學傳統及其轉變	周樑楷	《史學評論》第七期	1984.04.	歷史學
物質文明對歷史研究的反省性意義---評布勞岱日用生活的結論	翟本瑞	《思與言》23卷5期	1986.01.	社會學
法國年鑑學派領袖布勞代爾	賴建誠	《史學評論》第十二期	1986.07.	經濟學
理論、歷史與想像力--布勞岱的歷史世界及其對社會學的反省意義	張家銘	《思與言》24卷6期	1987.03.	社會學
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布勞岱的歷史分劃	翟本瑞	《思與言》24卷6期	1987.03.	社會學

B 法國當代史學主流——從年鑑學派到新史學	姚蒙	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1988.12.	大陸學者
B 世界體系與資本主義 --- 華勒斯坦 (I.Wallerstein)與布賀岱 (F.Braudel)的評介	陸先恆	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1988.12.	社會學
年鑑學派史家布勞岱對自我社會角色的認識	胡昌智	見氏著《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頁 124~132，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1988.12.	歷史學
年鑑學派的總體歷史理論	劉昶	收於氏著《人心中的歷史---當代西方歷史理論評述》頁 179~262，臺北：谷風出版社	1989.01.	大陸學者
韋伯論西方資本主義的「變」與「常」---以布賀岱為對照點	馬彥彬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高承恕指導	1989.05.	社會學
歐洲資本主義興起---布連勒(R.Brenner)與布勞岱(F.Braudel)的對照	蒲增為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高承恕指導	1989.07.	社會學
對布勞代爾《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的解析(上)(下)	賴建誠	《國立編譯館館刊》20卷 1、2 期	1991.06. 1991.12.	經濟學
經濟·社會·文明---年鑑學派及其史學模式	張廣勇	見張廣智、張廣勇合著《史學：文化中的文化》頁 355~384，臺北：淑馨出版社	1992.02.	大陸學者
以布洛克《封建社會》一書為例---探討年鑑學派的社會觀	王淑燕	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人類學組碩士論文，陳奕麟指導	1993.07.	人類學
年鑑史家的長時段時間觀---以布洛克、布勞代爾、雷瓦羅德里三人為討論對象	魏楓城	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周樑楷指導	1995.07.	歷史學

B 年鑑學派管窺 (上)(下)	賴建誠	新竹：作者發行	1996.	經濟學
布勞岱論底層結構與 上層結構互為建構的 歷史過程：以法國為 例	趙蕙鈴	《思與言》34 卷 1 期	1996.03.	社會學
「可能的限度」：布 勞岱論文明的成長	陳敏郎	同上	同上	同上
從「經濟世界」的觀 點論兩岸三邊經貿互 動的發展與限制	王明輝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陳介玄指導	1996.05.	社會學
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論資本主義的動力	何彩滿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高承恕指導	1996.06.	社會學
經濟生活的層級化與 近代西方文明之特質-- --對布勞岱(F.Braudel) 《文明與資本主義》 的初探	陳介英	《中國社會學刊》第 19 期	1996.06.	社會學
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與臺灣中小企業----一 份個人筆記	高承恕	此為作者為東海大學東 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所 編《地方社會》一書的 代發刊辭，臺北：聯經 出版事業公司	1997.03.	社會學
年鑑史學之「長時 段」的方法論及其對 於社會學研究的反思 意義	王崇名	《思與言》35 卷 3 期	1997.09.	社會學
布勞岱論工業革命與 資本主義	何彩滿	《思與言》35 卷 4 期	1997.12.	社會學
布勞代爾的寫作風格	賴建誠	《思與言》36 卷 1 期	1998.03.	經濟學
B 年鑑學派	張廣智 陳 新	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999.01.	

臺灣對年鑑學派的介紹，最早可溯自 1972 年，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編印的一部西洋經濟學者辭典(見表二)中，介紹布洛克及其兩部名著《封建社會》與《法國農業史的基本性格》，推崇布洛克「比較史學的研究觀點」，「為比較社會學創下了不朽的功績」。而稍後在于宗先所主編的另一部經濟學百科(1986.見表二)中，對布洛克的生平與著作，有著較為詳盡的介紹。可以說有很長一段時間，布洛克因其著作的某些特性，而被理解成一個經濟史甚至是經濟學家，這對畢生致力結合社會科學，做一個全方位歷史學家的布洛克而言，地下若有知，恐怕也要感到啼笑皆非吧？1976 年史學前輩汪榮祖先生寫下第一篇有關布勞代爾與法國年鑑學派的評介，此後年鑑學派才逐漸受到臺灣學術界的重視，相關的翻譯與評介性論文紛紛出籠。

七〇年代的著作甚少，在此姑且不論。八〇年代可說是臺灣對年鑑學派回響最熱烈的時期，由於臺灣社會的民主開放，大陸學者的著作漸可在臺流通，本地也不乏優秀的外語人才，各種內外在因素的匯集，將年鑑學派的引介，推向第一個高峰。其中曾留學法國的梁其姿，是臺灣史學界少數有心有力能直接透過法文，介紹年鑑學派的學者。由其糾集眾人合譯的《年鑑學派論文集》(1989.10.)，書中八篇論文遍及年鑑學派三代史家的重要作品，是瞭解年鑑史家的整體寫作風格與內涵極重要的中文參考資料。可惜的是，梁氏似乎認為其階段性任務已經達成，自此收筆，未見其再對年鑑學派所作的翻譯或評述。

史學圈之外，臺灣對年鑑學派投注心力最大、探討時間最長者，當推學經濟學出身的賴建誠。賴氏早年留學年鑑學派的大本營，巴黎的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因好奇而一頭鑽入此一陌生的領域，卻因興趣盎然而十數年樂此不疲，在中西經濟思想史的本業之外，以一探年鑑學派(關注焦點尤其在布勞代爾)門奧為職志，不斷有作品問世。由於賴氏中英法三種語文造詣均佳，所以不論評介或論述，均有可讀之處，其堅持的精神，在容易對西方理論隨波逐流的臺灣學界，可稱得上是獨樹一幟。

周婉窈譯的《史家的技藝》(1989.01.，布洛克未完工的遺作)，以及劉北成譯的《論歷史》(1988.12.，布勞代爾的歷史論文集)，是八〇年代協助臺灣學界，一探年鑑學派前後兩位大師的史學理念、寫作方法等極重要的作品，雖皆

轉譯自英文書，但也已算是難能可貴。譯文優劣當否，賴建誠已有所評(1989.12.以及 1992.01.)，值得注意的是，海峽兩岸的學術合作漸次成型，劉北成的譯作係直接在臺灣出版，能否算是臺灣學界的成果固有爭議，但大陸學界確實在八〇年代以後，在這方面對臺灣有著相當的影響。

除了譯介之外，對年鑑學派展開研究與討論的風氣，也於八〇年代(尤其是中期以後)，在臺灣學界散佈開來。其中集體成就較大者，應屬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的高承恕先生及其幾位有志於此的高足。在八〇年代早期，臺灣社會學界尚處於一片「韋伯熱」的時期，高承恕(1982.07.)似即意識到，布勞代爾從歷史時間、歷史空間、歷史整體乃至歷史結構等多層視角，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形成與演變所作的總體歷史解釋，較之韋伯，有著另類迷人的說服力。遂即在東海大學開課授徒，在臺灣社會學界尚未充份注意到布勞代爾時，便悄悄地在臺中大度山上，構建起布勞代爾的城堡，師生一起研讀布勞代爾解說資本主義的英譯鉅著《十五至十八世紀的文明與資本主義》。幾年的努力下來，先後幾位研究生，如顏建發、張家銘、陸先恆、馬彥彬、蒲增為等人，都有不錯的研究成果問世。這批東海出身的學人，除了為解釋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與發展多開一扇窗外，其最大的特點，是非常留意傳統社會學界較少關切的長期時間概念與歷史面向，以及社會學與歷史學的會通問題。其所提出的理念和方法，固未必全臻成熟，但所提出的問題，倒頗值得社會學與歷史學界共同深思。

八〇年代對年鑑學派的引介，另一個特色是，除了學術性刊物外，在一般社會大眾讀物，如《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國論壇》、《歷史月刊》上，也時常可見學有專精的學者為年鑑學派所寫的譯介性報導，這對提升其在臺灣社會的能見度，應有甚大助益。事實上，年鑑學派在法國社會的影響力，並不僅侷限在學術界，他們也透過各種大眾傳播媒體，如電視、廣播及報刊雜誌等，向一般大眾宣揚其學術理念。這並非媚俗，而是希望歷史不要成為一門令人望而生畏的冷學問，史學不走向社會，如何驥望世人來擁抱史學？某些年鑑學人的史學專著，如 E.Le Roy Laudrie 的名著《Montallou》，就是連法國前總統密特朗都大力推薦的暢銷書。這也是為什麼年鑑學派所帶動的法國史學革命，不會只是史學界茶杯裏的風暴，而能兼具整體社會影響力的重要原因。臺

灣的歷史學界，向來閉關自守，除特殊情況外，鮮少與社會作交流與對話，對年鑑學派的介紹，算是一個特例。只可惜在布勞代爾過逝之後，此一引介風氣便戛然而止，年鑑學派仍能只是學術界議辯的話題，幾與社會大眾無涉。誠如李弘祺(1984.10.)所言，年鑑學派並非獨居高樓、孤芳自賞，而是提筆走入社會，致力於寫出「芸芸眾生的歷史」，惟其如此，史學才不致遠離社會，甚至最後成爲時代的灰燼。這樣的理念，聽在目睹今日歷史教育備受排擠、史學幾乎淪爲社會科學支流的臺灣史學界袞袞諸公耳裏，不知可否有振聵啓聵的啓示作用？

由於臺灣學術界少有人願意低頭做植基的工作，因此很多引介年鑑學派的基礎工作，便不得不由大陸學者代工完成。不論是劉北成(1988.12.)、姚蒙(1988.12.)等在臺灣出書者，或像劉昶(1989.01.)、及稍晚的張廣勇(1992.02.)等在臺灣翻版改印者，在欠缺完整介紹年鑑學派的中文著作的環境下，這些大陸學人的作品，事實上對本地學子有著極深刻的影響力。這群引介年鑑學派的大陸中青輩學人，有的長年鑽研西洋史，有的則是實際負笈海外，都較能不受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框制，爲文立論尙稱公允，不致有太嚴重的意識型態包袱。只是大陸學者的作品，水準頗參差不齊，姚蒙因曾留學法國，親受年鑑學風的洗禮，所以行文流暢，論述也得體，他的《法國當代史學主流——從年鑑學派到新史學》，在臺灣，只要是對年鑑學派有興趣深入瞭解的年輕學子，說是人手一冊，應不爲過。但像劉北成可能因本身對年鑑學派的瞭解不是很深刻，《論歷史》一書就有不少讀來莫名所以的譯文(參賴建誠的書評)。劉昶、張廣勇則是幾近土法煉鋼的方式，未對外文原典多作參考，直接轉引大陸出版的中文作品而成篇。一般而言，大陸學者對於年鑑學派與馬克思主義史學，都有其自覺式的檢討，如姚蒙就曾說道：「年鑑——新史學從未要求過意識型態的統一，也摒棄了價值判斷的介入。但是，在研究題目的選擇中，在歷史解釋機制的最終確立中，我們所見到的不正是史學家各自的哲學觀、歷史觀、政治觀的一系列表現嗎？馬克思主義史學正是在這裏與年鑑學派其他史學家有著最明顯的區別。」(頁 214)言下之意，二者孰優孰劣，明眼人應立可判讀。張廣勇在述評年鑑學派的種種之後也說：「年鑑學派的目標不是爲了推行某種新教條或新哲

學，而是要求建立一種新觀念和新方法。它不是把史學家限制在某種嚴格的理論框框中，而是強調理論要為實踐服務。」(頁 381, 1992)這段話話無意中也批判了大陸學界過往史學研究的根本弊端所在，反對意識型態教條優於一切的不合理現象。另外，在張廣智與陳新師徒合著的《年鑑學派》(1999)，則是用普及化的語言，娓娓道述年鑑學派七十年來的發展概況，該書最後的結語：「釋『年鑑現象』」中指出了解釋年鑑現象，無疑也是在解析當代的西方新史學、一種史學現象及文化現象，呼籲海峽兩岸學術界，應相互結合，「在全球意識下發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頁 208)，頗為語重心長。當然，要求整個大陸學界就此自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桎梏中掙脫，並非易事，但我們仍很欣慰見到歷經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後，有中青輩的學者敢於突破這數十年來的教條框架，純就學術論學術。以大陸豐沛的史學人力，縱使目前所見仍有若干闕失，但若循此道路前進，未來發展恐未可限量。臺灣史學界是要設法加緊領先的腳步，或是拱手將江山讓人，是值得深思的課題。

時序進入九〇年代，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臺灣對年鑑學派的引介與討論，也步入一個新的時代。其中最顯著的標記，應屬賴建誠集其十多年心力而成書的《年鑑學派管窺》的出版。誠如李弘祺(1996.09.)在為此書所寫的書評中所言：「《年鑑學派管窺》的出版，代表了賴建誠一段心路歷程的結束。有了這兩大冊的著作，在中文世界研究歐洲歷史的人，從此就有了十分翔實可靠的指引，而要從事『大歷史』研究的人，也可以有一本十分有用的參考書。」賴建誠恐怕還是第一個對西方歷史學派(尤其是非英美地區)作如此深入且長期譯介與論述的臺灣學人，今日我們能直接透過中文即對年鑑學派的種種，有深刻且正確的理解，賴氏的長期苦心耕耘，委實功不可沒。

另一件值得一記的事是，歷史學界終於也端出了自己人對年鑑學派較具體的研究成果，有了第一本討論年鑑史學理念的碩士論文(魏楓城，1995.07.)。可惜這不是一篇論點成熟的論文，除了綜述年鑑三代學人的長時段理念之外，看不到太多作者的創見，且其中還不乏某些對年鑑學派的誤解。如作者在論文頁 2 中說道要「探討長時段時間觀的形成及轉變，進而剖析長時段時間觀如何運用於近代史」，並認為這有助中國史家洞察近代歐洲歷史的發展。這其實是根

本誤解了年鑑史家，特別是布勞代爾的所謂長時段概念，近代史事實上並不足以成爲長時段的觀察單位，而年鑑史家中不管是布洛克或布勞代爾，其長時段理念的應用(實際上也是年鑑史家的專長)，是在中古史而非近代史，將長時段用以解釋近代史，正犯了命題與實踐相矛盾的錯誤。

說到對年鑑學派的理解和誤解，九〇年代的一場小爭議，也頗值一提。起因是賴建誠(1992.04.)對張家銘先前所發表的一篇論文(1987.03.)有所論評，大意是認爲張文誤解了布勞代爾的史學理念，不同意張氏所言布勞代爾具有濃厚的社會學傾向及畢生致力於建立歷史社會學等觀點。此文一出，迅即引起當事人張家銘爲文還擊(1992.06.)，認爲賴氏並未完全正確理解他文章中的真正意涵，亂貼標籤的作法，有欠公允。一個是臺灣長期浸淫在布勞代爾世界的名家，一個是在東海大學受教於布勞代爾的臺灣知音高承恕的高足，這本來應該是一場精彩可期的學術辯論，可惜的是，不知因何緣故，雙方交鋒僅此一回合即告鳴金收兵，沒有後續發展。其實若細觀賴建誠的文章，可發現被他批評的，還包括顏建發(1984.04.)、翟本瑞(1986.01.&1987.03.)、陸先恆(1988.12.)等張家銘的同門師兄弟，卻未見其中任何一人有所回應，或許是默認賴建誠批評得有理吧？臺灣學界還很少爲了對西方史學家理解不同，而致產生學術上的辯論，站在旁觀者的立場，總希望真理能愈辯愈明，只要不作人身攻擊，相互詰難又何妨？這場論辯的曇花一現，反應的也正是臺灣學界不願對話的生態現象，我們對西方理論與觀念的許多誤解與濫用，或許也正源於我們懶於論辯的學術風氣吧？

除了研究論述漸多外，九〇年代臺灣學界對年鑑的理解，與八〇年代最大的差異，乃在已逐漸由視若圭臬般地譯介摘述，更進一步地加以指責批判，這在數十年來引進西方史學流派的歷程中，還是少見的現象，顯現的正是臺灣學界有自信的一面，其代表人物就是賴建誠。縱觀賴氏早期對年鑑學派的引介，與一般學界對西方史學理論或流派的介紹，並無二致，翻譯之外，多半是站在崇拜巨人的角度，作名著的內容摘述，尙未能真正深入敵陣，揪出西方史家史著的缺失所在。但在九〇年代以後的作品中，賴建誠似乎自認已具備向巨人挑戰的能力，多篇作品均命中年鑑史學(尤其是布勞代爾)的要害，批評也愈形尖銳，所言甚至是當今西方史家尙無人敢言者。其中最有代表性意義的，當是他

長達近七萬字的宏文〈對布勞代爾《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的解析(上)(下)〉(1991.06.&1991.12.)。布勞代爾這部鉅著，如今幾乎已成為可與馬克斯、韋伯鼎足而立的資本主義力作，頗引起臺灣社會學界的重視，觀察表三也可以發現九〇年代以後，對布勞代爾這部書的討論逐漸增多¹，但在廣度與深度上，均略顯不足，真正欲求對布氏這部厚達兩千頁的鉅著，有一深刻且快速的理解，還是得求助於賴建誠這篇解析。賴氏說「任何人都可以當導遊，其必要條件是，從頭到尾細讀一次，然後再快速地翻閱一次以上」(上篇頁 155)而在這篇〈解析(上)〉中，賴氏可說是一個十分稱職的導遊，從「架構與內容」、「概念解說」等兩方面，完整地介紹布勞代爾這幅超大型歷史壁畫的架構與理念，文章雖長，但讀來一氣呵成，全無滯澀感。但更精彩的還在〈解析(下)〉的「綜合評論」部份，有頗多直拳正中巨人鼻樑的評論。如他認為，「就寫作方法而論」，這部書中布氏的「舉證方式有略為過份炫耀淵博之嫌」(頁 191)，又認為整部書的重點在第三冊，前兩冊是屬於法國傳統博徵學派「百科全書式的寫法」、「看不出一個有機的結構」，諷刺的是，博徵學派的歷史寫作法，正是年鑑學派向來極力反對而以此自我標榜的(頁 192)。他也舉例說明「布勞代爾的寫作法有時是不夠嚴謹而有湊資料之嫌」(頁 193)，「另一個寫作上的缺點是，他有時提了一個問題的頭，然後也沒處理，就留給了讀者自己揣摩」(頁 196)，在賴氏看來，「《資本主義》是未入虎穴之作，是綜合者的作品，《地中海》才是挖礦者與再製者，《資本主義》是開了超級市場當了經理，對各項貨品都很瞭解，(但卻)是一項較不流汗的工作」(頁 199)，雖然他不否認開得起這種超級大賣場的人也不多，但仍然「傾向於認為布勞代爾的資本主義發達史是『熱度』(引起出版與讀書界的熱潮)大於『亮度』(歷史的洞識)」(頁 199)，賴氏甚至大膽預測，「如果布勞代爾這套著作在下一世紀仍有人參閱的話，那會因為是它百科全書式內容的吸引力，大於它在架構、概

¹ 除了表三所列外，另有幾篇論文雖標題不以布勞代爾為主，但內容頗有涉及者，如丘延亮〈從認識論的高度再思考“發展經濟學”〉，《臺灣社會研究季刊》，一卷一期，1988年春季號；沈宗瑞〈資本主義體系的長波〉，清大共同科《社會科學論叢》第一輯，1988年；陳介玄〈合理的勞動組織與近代資本主義精神——對韋伯新教倫理論題的再思考〉，《中國社會學刊》第13期，1989年12月等文，均可供參考。

念、理論與細節論證方面的說服力。」(頁 199)這些對史學大師與鉅著的指摘，均有憑有據，絕非無的放矢。這種見識與勇氣，正是我們向來在引進西方權威理論時最欠缺的。反觀社會學界許多討論布氏資本主義的論文，讀後均無如此令人痛快淋漓的感覺，似多仍停留在導讀與理解的層次，缺乏像賴建誠單刀直入、直搗黃龍的功力。臺灣其實沒有必要再掀起繼「韋伯熱」之後的另一股「布勞代爾熱」，社會學界人才濟濟，或許應對賴氏的評論作一番理性的檢討，莫對布勞代爾一頭熱。除了這篇長文之外，賴建誠另有幾篇較短的書評，對布勞代爾的諸多缺失，批評也同樣絲毫不假以顏色。如在評《論歷史》(1992.06.)中，認為該書的十三篇文章是「三好三壞七中等」，「可見大師級的人物也非篇篇皆上品」(頁 165)，並對布氏經常高舉自己的三大法寶(長時段、總體史及史學與社會科學整合)來框套他人著作，感到十分不以為然，「不合框框的就攻擊，未免主觀性過強」(頁 165)，甚至還質疑布氏就穿著這麼三件衣服縱橫學界近半世紀，「難道他沒能力多做幾套新的嗎？」(頁 166)在評《法蘭西特性》(1997.06.)一文中，則認為全書的架構在「歷史概念與分析手法上都未超過《地中海》」(頁 240)，「整體的感覺是，他博學多聞，偶爾有一些不錯的見解，可惜大部份篇幅流於摘述，因而缺乏深入動人的說服力」(頁 249)。評《文明的文法》(1997.03.)則直接了當地說「我不相信有『文明的文法』這回事，我也不認為布勞代爾的『長時段』概念，能有效的增進我們對文明史的理解。」(頁 189)這麼尖銳的批評，乍看之下，很難想像是在點名世界級的史學巨擘布勞代爾，更難想像是出自一位臺灣經濟學者之口。賴氏的評論是否完全得當姑且不論，但至少讓臺灣學界知道，對於年鑑學派，除了景仰與學習之外，我們應該還有更寬廣的討論空間。

參、反省與檢討

行文至此，似乎可以看出，年鑑學派雖是個不折不扣的歷史學派，但縱觀二十多年來臺灣對其引介研討最力的，卻是社會學與經濟學界，相較之下，史學界真正具體的貢獻並不多。若以社會變遷的歷史脈絡來觀察，年鑑學派被大

量引進臺灣的八〇年代，正是臺灣社會由威權專制走向民主改革的關鍵年代，學術界也逐漸對外開放，不再有任何人能一手掌控所有的資源。因此年鑑學派在臺灣的傳播，若與早年美國新史學、德國蘭克學派相比較，其最大的差異就在，臺灣已不再有能登高一呼、萬眾景從的史學鴻儒，過去「史學就是史料學」式的歷史謬誤，幸而未在年鑑學派的播

過程中重演，而這似乎也正符合年鑑學派向來不強調理論教條與意識型態的史學風格，我們也慶幸自己能夠理性健康地理解年鑑學派。史學界過去在韋伯熱潮中，參與也還算踴躍，反而是對與史學同行的年鑑學派，討論未見相對熱烈，倒是個頗有意思的話題。

臺灣的社會學界和經濟學界，會對此一西方歷史學派感興趣，在過去也是少見的情形。推測這可能跟年鑑學派的某些主張，如長時段的分析單位、總體史的研究法及強調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對話等有關。社會學界長年以來在建立模式、解釋理論時，忽略時間因素與每一個社會不同的歷史縱深，以致經常出現張冠李戴或孤證無力的弊端，不只外界詬病，社會學界也已自覺思考解決之道，從年鑑學派的身上，他們應可獲得很好的啟發。至於歷史學與社會學乃至一切社會科學的結合對話，已經不是新鮮課題，二十年來不斷有個人或集體的呼籲與討論²。只是討論歸討論，在實際的運作上，並不全如想像中順暢，經

² 個別的論述，較著稱的如余英時為《史學評論》第一期所寫的發刊辭〈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1979年7月)中，即強調「史學是一種綜合貫通之學，必須從其他相關的各種學科中吸取養料」，這篇論文在此後幾期的《史學評論》中引起頗為熱烈的回響。張玉法在《歷史學的新領域》(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年)及高承恕在《理性化與資本主義——韋伯與韋伯之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年)中，也有多篇文章論及此。集體的討論成果方面，據筆者所知有兩次，一是1974年6月由思與言雜誌社主辦的「社會科學與歷史學討論會」，會中邀集了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心理學與歷史學等領域的五位學者對話，並有數十位學者專家參與討論。另一次是1981年5月由中研院民族所主辦的「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討會」，會中高承恕、文崇一及賴澤涵等人的報告，也都觸及此一課題，參與此會的眾多學人發言內容，也頗有可參考之處。這兩次討論會均結集出版。又中國社會學會也在1985年7月舉辦「社會學的歷史研究研討會」，會中有多篇文章為社會學研究者對中國及臺灣社會史的研究。除此之外，康樂、黃進興主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1年)，則是譯介十一篇外國學者對此一課題的論述，頗有啟發性。又如黃俊傑編譯《史學方法論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年)、李弘祺編《史學與史學方法論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80年)及杜維運、黃俊傑合編《史學方法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年)等中外論文集，也都彙集了頗多這一方面的論文。

常可見的是，社會科學研究者濫用或誤用中國史的史料，作一廂情願或斷章取義式的論述。要不就是歷史學研究者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引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作不成熟的歷史解釋。多數耆宿級的歷史學者，則根本不屑用十九世紀以後才漸次成型的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來解釋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歷史，而仍習於傳統敘述與考證史學的寫作。我們實在看不出，討論了二十來年的史學與社會科學整合，究竟有甚麼具體的成果呈現。這種情形其實不單只在臺灣，即使是在西方學術界，也大同小異，年鑑學派之所以能夠快速崛起於世界史壇，與其幾位開山宗師在這方面的雄厚功力與具體著作，不無關係，因為他們是真正做到了一般史學家想做卻做不到的事業。科際整合是一件說來浪漫、行來艱難的工作，年鑑學派成功地做到了，面對其如山的成就，臺灣史學與社會科學界凡是有心於此的人，恐怕都還有迢遠的路要走。

整體檢討起來，臺灣對年鑑學派的引介雖不無成就，但不論是在翻譯、評介與研究論述等方面，確實都還存在某些瑕疵，以下分項述論之。

1.在翻譯方面，因筆者不懂法文，英文原著也並未全數熟讀，所以對譯文的優劣當否無力置評。所想指出的是幾項普遍的缺失，一是譯名太過雜亂，人人各行其是，單是 F.Braudel 一人，目前所見就至少有五種譯名，這對作中文資料索引而言，是極無效率的事。學術界的這個百年老問題，眼看就要邁入廿一世紀，但似乎仍然看不出有解決的希望。其二是譯文應該力求流暢易讀，不管譯自英文或法文，均應交給具備專業知識背景的人來做，在遇到關鍵問題時，才不致囫圇吞棗，亂譯一通。這種惡例，以劉北成所譯的《論歷史》一書為最，頗不可原諒，其實其他人的譯作中，也不乏這種情形，細讀即可尋得。三是翻譯應尋真正值得一讀的名著，並力求避免資源重複浪費。在翻譯年鑑名著的工作方面，臺灣實在落後大陸太多，布勞代爾的多數鉅著，大陸方面據悉均已全書譯出³，而臺灣卻只有賴建誠譯出了《地中海》的一小部份，相較於大陸

³ 如唐家龍、曾培耿、吳模信等譯《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顧良、施康強譯《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1993年)、顧良、張澤乾等譯《法蘭西的特性：空間和歷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等等。

學界與出版界的積極態度，確是值得我們檢討。「研讀偉大的史著，正可幫助一個歷史學生恢宏他的視野，幫助他找到他所應該採用的方法，反省他所受時代風尚的影響。學習歷史的專業學生真是不可忽視史學名著的重要價值。」⁴「我們不會苛責一個美國學者一定要通法文才算瞭解年鑑學派，但臺灣的學風，卻經常有意無意間鄙視透過中文著所作的外國史學研究，這也使得很多學者將翻譯視若畏途，不願投下心力從事。連名著的翻譯都付之闕如，還能談甚麼對年鑑學派的深入研究？誰都知道，只要翻譯得好，理解上未必輸給原著，試問今日作年鑑學派研究的，除了少數精通法文的學者外，有幾個人不是透過英文譯作來作理解的呢？如果不是缺乏自信，為甚麼我們相信英譯卻不能接受中譯呢？另外要說的是，翻譯工作應該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做最有效率的事，不應該重複投資。茲舉姚蒙、李幽蘭合譯的《法國當代新史學》(1993.09.)這本年鑑史學論文集為例，其中的幾篇論文，如第一章的〈新史學〉、第六章的〈心態史〉，在本文表一中可發現梁其姿皆早已全文譯出(題目略異，分別是〈新歷史〉〈心態歷史〉)，梁氏法文功力應可無庸置疑，豈有勞隔海招請大陸學者再重譯一次之必要？又如江政寬所譯《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 1929-89》一書，譯文尚屬通順，但揆其內容，試問與姚蒙、賴建誠之前所寫的相關著作，相去幾何？九〇年代的臺灣學界，已有批判年鑑學派的功力，卻仍在翻譯此等敘述性的入門書籍，不是相當地荒謬嗎？

回頭檢討歷史學界。自表一中可以發現，扣除賴建誠與大陸學者的代工作品後，歷史人在這方面的貢獻十分有限。這種現象的產生有幾點可能，一是史學界可能較愛好原文資料，不喜歡翻譯的作品，二是本身的外語人才不足，沒有多餘人力可致力於此，三是可能根本不屑從事翻譯工作。筆者就個人的學習和研究經驗要指出的是，能有時間精力和機會，多學幾種外文、翻閱外文著作固然很好，但這只能是個期待，在現實層面上，能有此能力與機運的人其實很少，職是之故，要快速一探年鑑學派究竟，透過良好的中文翻譯，仍應是最為方便有效之道。其次是外語人才(特別是英文以外的第二外語)的缺乏，已是個

⁴ 見李弘祺，〈學習歷史應該研讀史學名著〉，《出版與研究》，第28期，1978年8月。

老問題，也是史學界數十年來揮之不去卻少人願意確實面對解決的問題，這牽涉到課程規劃及學術生態等大課題，恕筆者無力在此細論。至於成名學者不願從事翻譯工作，以臺灣目前的學術現況而言，倒也無可厚非，但如果認為名著翻譯確屬要事的話，又何妨容許研究生以翻譯外國史學名著的某些篇章的方式，來替代專題式的學期報告。事實上，好的翻譯所需投下的心血努力，未必少於一篇東拼西湊的報告，問題在於很多教授不願承認翻譯也是學術成就的一種。這種鄙視翻譯的心態不變，再過十年二十年，前面我們所談到的問題，恐怕依舊得不到解決。

2.在評介方面，筆者沒有太多意見，只不過要再強調一次，臺灣史學界應該培養兩種風氣，一是走出研究室，迎向社會大眾。住在象牙塔裏孤芳自賞固然很幸福，但長期不食人間煙火，漸和整個社會脫節，久而久之，人們不愛讀歷史，史家寫的作品成了自己人的小眾讀物，進不了普通家庭的書房客廳，史學對社會的影響力自然日漸式微。看看今日臺灣各級學校中歷史課程的逐漸縮減，歷史系所畢業者謀生備感艱難，正是史學界數十年來遠離群眾所結下的惡果。在這一點上，年鑑學派當然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但其實際運作情形如何，卻不見學界有充份的介紹，委實令人遺憾。其次是史學界應養成勤於寫書評的風氣，學術研究最怕的不是眾人勇於批評，而是大家都鄉愿保守，不想得罪人，不願作良性的批評。誰都知道，學術要求進步，研究成果應該接受各方檢驗，才能驗出病端，汰莠存菁，才不致一再犯同樣的錯誤。可是在臺灣，年輕一輩的不敢輕易批評人，怕資歷太淺、人微言輕，更怕一語不慎、得罪多方，而前輩學者更不願寫書評，因為對自己的學術令譽無所增長。但我們看到，年鑑學人像費弗爾、布勞代爾等，即使在成名之後，還是非常勤於寫書評，這一則顯示他們不斷在吸收新知追求進步，再則也可刺激學術研究良性循環，讓用心撰述的好作品出頭，也給企圖魚目混珠者警惕。臺灣學界之所以有很多濫竽充數的著作橫行，正是這種不願評介他人作品的學風所造成的。

3.在研究論述方面，觀察表三，這部份以社會學界的著作居多，筆者完全不懂社會學，但站在一個普通讀者的立場，對於社會學界的研究者有幾句話要說。首先是閱讀外文原典固然辛苦有加，不過內容應先經過深刻的消融，變成

有自己論點的作品後，再向讀者公開，會比較有積極的意義，但年輕一輩的社會學研究者，似乎都太心急了，自己都還沒有消化完全，就急著要反哺給讀者，結果是通常讀後除了多一點兒知識外，沒有增長多少見識，甚至比還沒看以前更加糊塗。像趙蕙鈴(1996.03.)和何彩滿(1997.12.)的文章，滿篇皆是摘述布勞代爾在《資本主義》一書中的看法，至於這些看法是否恰當？有無可商榷批評之處？或者對於我們能否帶來甚麼具體啟發？卻全未見提及，甚至連作者本身的閱讀心得也看不到，而這些卻往往才是讀者最想一探究竟的。如果要為布勞代爾的著作寫讀書摘要的話，這樣的文章也略嫌粗糙簡陋，況且現在布勞代爾的幾本鉅著均已有中譯本，讀者人人可自閱讀過程中整理出一大套的摘要，不勞作研究工作者費心。如果說轉述大師看法也能算是一種學習成果的話，那也應該留著交學期報告，或在課堂上討論即可，公然對外發表，就未免太低估學界的閱讀能力。其次是許多年輕學人似乎都企圖心過大，動輒短短兩三年內要作成對兩位甚至三位世界級大師的比較評論，似乎只研究一個人不足以成其大，這種心態在社會學研究所的學位論文中表現得最明顯。精神誠然勇猛可嘉，但事實上，很多沉浸在某一位大師的學術領域中十數年的老前輩，都不見得能把所有相關問題都搞懂，更遑論研究生經驗稚嫩且有沈重的課業壓力。企圖心太大而能力時間無法配合，所展現的結果，往往就是論述不夠深入，或只能為每位大師的論點作綜述整理，而無法進行細部討論，當然也提不出甚麼有益學界的創見，實在相當可惜。最後，是許多社會學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社會學與歷史學會通的課題，但對這個問題的實際看法，卻又往往似是而非。平心而論，社會學與歷史學的交流對話之所以困難，乃在雙方面瞭解的不足，史學研究者要是肯靜下心來讀幾本社會學的經典名著，社會學者若是肯潛沉幾年於歷史學的浩瀚中，雙方的對話自然就容易多了。當然這還牽涉到雙方的本位主義心態，甚麼時候彼此能坦承「人」才是研究的主體，歷史學或社會學只不過是有助瞭解人的一種客體學門，這才能真正地談到史學與社會學甚至社會科學的整合。最困難的一點也正在此，大家都是光提倡而不行動，要不就是說法令人不敢苟同。以王崇名(1997.09.)的文章為例，其最後結論說：「年鑑史學經由對於歷史複雜性的充份掌握，已經感受到社會與文明的時間與存在，臺灣的社會學與歷史學，一直在西方的理論上打轉，鮮少進入自己的社會與歷史，對於歷

史的複雜性幾近簡單的理解。」(頁 83)關於社會學筆者無可置評，但不知王先生又對歷史學瞭解多少？中國本身並沒有社會學的傳統，之所以一直必須在西方的理論上打轉，那是因為這原本就是近代才引自西方的舶來品，在未充份本土化之前，如何能脫離這種學術依賴的宿命？中國史學有著兩千年以上的優久傳統，沒有建立系統的歷史哲學與理論，固是其常受西方史家嘲弄之處，但這並不代表中國整體史學成就不如西方，之所以要引用西方理論，是為了加強自身歷史解釋的週延性與說服力，而幾乎每個研究歷史的人，深入之後都會謙虛地讚歎歷史的複雜性，任何時代、任何領域，從未有人敢說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怎麼能說歷史學界「對於歷史的複雜性幾近簡單的理解」呢？這話可能只有用在社會學研究者身上比較合適吧！至於是否進入自己的歷史，絕不是簡單三言兩語可以說盡的，用年鑑學派的那一套長時段觀來判斷適合嗎？王先生不是反對史學界在西方的理論上打轉嗎？可是知不知道不勞代爾的那套理念，並不是研究歷史的萬靈丹或至尊法寶，一語否定掉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史學成就，不嫌太武斷了點嗎？

肆、結語

誠如黃進興先生所言：「光憑西學理論究竟只能糊口渡日，並不足以成就大事。再多、再高明、再先進的西學，充其數只能將中國歷史降為普遍的事例而已，實質上並無法彰顯中國獨特的歷史經驗。」⁵近百年來，中國不斷地從西方吸收各種先進的史學理論與方法，藉以充實中國史學傳統中較虛弱的一面。但幾乎無分清濁地照單全收的結果，卻常產生橘踰淮為枳的消化不良現象，每一種理論或方法的形成，莫不有其相應的歷史與社會背景，忽略了這點不可共通性，硬要生吞活剝別人的既有成果，導致營養不良是可預知的。年鑑學派所提倡的幾套觀念與作法，其實並非從天而降或突發奇想式的新異事物，只是他們在自己的史料基礎上成功地將其理念轉化為確實的著作，我們是否也可以如法泡製呢？中國史學的獨特性，經常使得它成為許多西方原則的例外，即使是

⁵ 見氏著〈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六期，1997年，頁283。

年鑑學派那套自認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法寶，恐怕也同樣涵括不了中國史學的特殊性⁶。

二十多年的歲月過去了，在行將邁入廿一世紀的時刻，中國史學的重大課題，應該不在吸收更多的西方理論，繼續為洋人作嫁抬轎，而是要如何才能走出自己的路。年鑑學派在戰後半個世紀的奮鬥中，從向德國學習而超越德國，甚至將影響力推向美國、擴及全世界，開闢出法國史學的新路，這才是我們最須要學習的。說是民族自尊也許太八股，但近十年來，中文史學界確實已有人默默在努力走出中國人自己的史學道路。一九九〇年初，中研院史語所一群新銳研究人員創辦《新史學》雜誌，標榜要納百川以成其大，為新時代的中國史學做見證。其他還有黃仁宇提倡的「大歷史」⁷、許冠三的「大(活)史學」⁸或者黃進興所謂「別有特色的史學」⁹，這些概念的提出，不論是否受到年鑑學派的實質影響，所彰顯的事實是，在受西方史學理論數十年的衝擊與洗禮之後，有自覺意識的研究者，不再甘於終身為人搖旗吶喊，而想用自己的腳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話說自己的想法。雖然概念架構稍嫌薄弱，成果也尚未累積到國際水準，但相信行遠必自邇，成大海者由於涓滴，持之以恆，或許我們真能像年鑑學派一樣，走出一條屬於中國史學自己的新路！

⁶ 深諳年鑑史學的梁其姿在〈心態歷史〉一文中即曾談到：「除了一些個別的瑣碎的例外，心態在中國史研究方面幾乎是一片空白。雖然最近已有史學家如謝爾尼(Jacques Gernet)在提醒我們，但我們難免要問，是否中國歷史發展的獨特經驗把這方面的研究的可能性減至最低呢？抑或中國遺留至今的史料性質並不宜於這方面的探討呢？只有等到我們在這個領域積累更深入的研究後，這些問題才可能有較滿意的答案。」《史學評論》，第七期，頁97。

⁷ 黃氏向來強調看歷史應力求放寬視野，要有如同經濟學上 Macro Economy 的概念，而主張要建立 Macro History，無論是從短期歷史看整體的《萬曆十五年》(臺北：食貨出版社，1985年)或是後來由長期歷史看中國發展的《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3年)，都強調此一頗神似於布勞代爾的長時段的概念。不過也有人批評他的大歷史相較於布勞代爾的長時段，「顯得想像力充足，但理論架構不足」。參高雅菁對《萬曆十五年》的書評，《當代》，第80期，1992年12月。

⁸ 參氏著《大(活)史學答問》(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6年)，所謂「大史學」精要而言共有四大：「根基深厚之大」、「兼容並包之大」、「門戶開放之大」及「宗旨正當之大」，並強調其大史學所講求的，既非英式的「元史學」，或美式的「後設史學」，亦非法式的「整體史學」(頁71)，頗有建立一家之言的氣概。

⁹ 參同註5。